神笔马良的永久魅力

洪 运

我的爷爷洪汛涛先生一生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地为小朋友写作，是少年儿童忠实的好朋友。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的日子里，我们格外怀念他。

爷爷生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九日，浙江浦江人，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理论家，被人们誉为“神笔马良之父”，与叶圣陶、张天翼等齐名为“中国童话大师”。

由爷爷根据《神笔马良》编剧的电影《神笔》，获五个国际大奖，国内获文化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五年影片编剧一等金质奖章，是新中国第一部参加国际电影比赛的儿童片，也是中国在国际上获奖最多的一部影片。当年，茅盾和夏衍都赞许过他的这一作品。

我记得，课文中《神笔马良》的篇幅不长，故事也并不复杂，但有着耐读的永久魅力，因为作品出色地塑造了马良这个人物。尽管作品中人物形象离我们很远，是古代的，但同学们都很喜欢马良勤奋、好学、机智、勇敢的美德。老师和同学们都非常想知道爷爷是怎样写出这样一部经典作品的，爷爷在回答提问时说：“马良不是我。不过，我不否认，‘神笔马良’中有我的影子，马良的某些经历和我有一定的相似。”任何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这样，作品里一定有作者自己。

爷爷的童年生活在最底层的人民之中，饱尝人间各种艰难困苦。爷爷说：“我的童年，自然是苦难的、黑暗的，因为那是在苦难、黑暗的旧时代里。我的童年，充满着饥馑和屈辱。”

爷爷的父亲早年背井离乡，长年不归，母亲因三个孩子拖累，没法在外找工作，便自己在家养蚕，闲时替别人做针线生活。有时给别人糊火柴盒，挣点零花钱，贴补家用，艰难度日。

爷爷从小爱好书法雕刻，酷爱文学，兴趣广泛，聪颖过人，勤学苦练，自学成才，四岁学会下棋，七岁会拉胡琴、吹笛子，十多岁就开始向报刊投稿，还搜集了大量民间文学和民间美术作品。

爷爷小时候大部分时间生活于以分销报纸为业的外祖父家。爷爷回忆道：“我的母亲也是一个劳动力，报纸一来，就紧张地工作起来。后来，我渐渐懂事了，每天报纸一来，母亲便给了我一叠报纸，我就坐在工作台一角，安静地看起报纸来。”

那时的浦江，经济还很萧条，文化也不发达，整个县里没有一家书店，只有这一家“报纸分销处”。后来信息渐渐传开，上海、杭州的一些书局和印书馆主动寄来一本本图书目录，希望能为他们经销书籍。可是，爷爷的外祖父没有更多的资金去营销书籍了。于是，这一本本图书目录，便落到了爷爷手上。爷爷在这些目录的书名上，用颜色铅笔做上许多记号，自己最想看的用红笔画上一个圈圈。他还写好向书局邮购的书单，也写好了信封，只等有了钱就寄去。爷爷说：“那时候，我们这号家境不好的穷孩子，是一个铜板的零花钱也没有的，只有在过新年的时候，长辈为了图吉利，给了个‘红纸包’——用红纸包裹的压岁钱，可是凑起来，总也到不了一块大洋的。而且往往不等过完年，又给母亲‘借’去挪作家用了。所以，我写好的好几封邮购信，从来没有一封发出去过。我十分希望能看到这些书，可是我没有。我连做梦都想。”爷爷没有书看，就一遍一遍读那些图书目录。

爷爷从这些断断续续的图书目录介绍中，知道了一些古今中外的故事，其中他特别喜欢王冕的故事，王冕幼年出身贫苦，白天为人放牛，一边自学画画，晚上则到寺庙内的长明灯下读书，最后成为能诗善文的杰出学者。爷爷自己生活清苦，对这样肯刻苦学习的苦孩子格外敬佩，并处处以他为榜样，时时以此勉励自己。

爷爷从小识的字多，上小学是跳级的。当时钢笔还很稀少，是颇为名贵之物。有的同学衣服的口袋里插着一支闪亮的钢笔，那是非常神气、叫大家羡慕的事。爷爷说：“童年的我，非常想有一支那样的笔，可是我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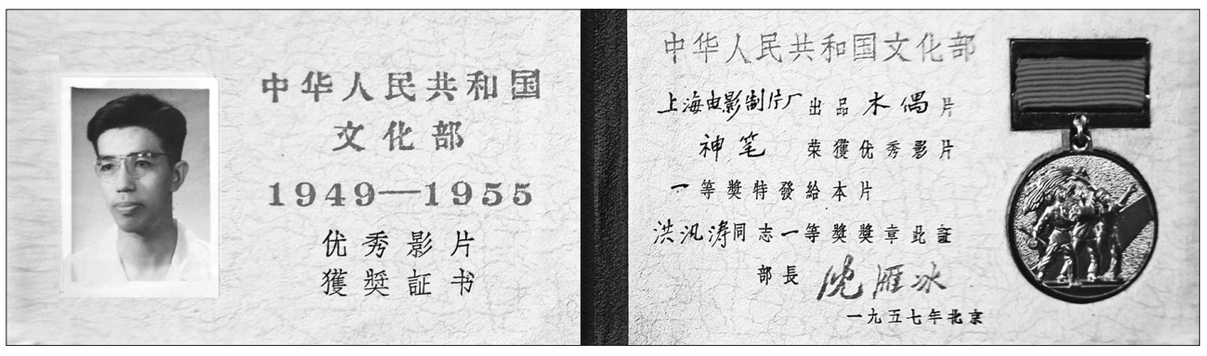
一次，在都市里做事的叔父给了爷爷一支用过的旧钢笔。虽然这笔尖早已磨粗，笔杆子也漏水，一写字，中指的硬茧上全是墨水渍，有时不小心还会把衣服的口袋也滴上墨水，可写起字来还是很流利，爷爷仍然非常喜欢它。有一回，跳远比赛后，爷爷回家发现这支笔不见了，急得立即赶到学校，在漆黑一片的操场的沙坑里，用手翻掏，手指都擦破出血了，才找回那支笔。后来这支笔一直跟随爷爷在浙东山区流浪、漂泊。

爷爷在童年就有一个心愿。“因为我爱笔，搜集有很多笔的故事，我便想到了要写一部以笔为主线的书。写一个少年有一支神笔所发生的一切的故事。”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一切优秀的文化创造，一切传世的精品力作，都是时代的产物。”由于爷爷这些丰富的人生阅历和苦难的童年经历，以及作为一个文学写作者的责任感，爷爷创造出“马良”这个饮誉中外的人物，写出了不朽的经典童话名著——《神笔马良》。确实，如果爷爷没有这样的经历，没有对于国家、民族、人民深深的爱，没有饱满的激情，没有扎实的基础，是绝写不出《神笔马良》这样优秀的作品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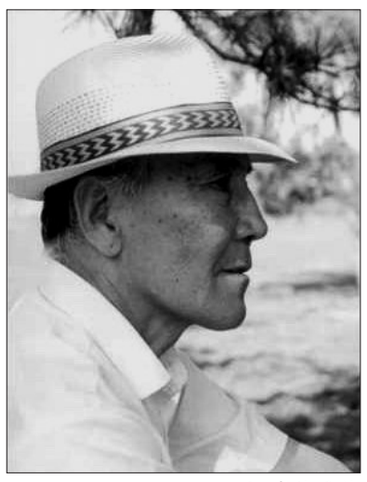
近日，《光明日报》在《从“贴吧”看当今大学生思想取向》一文中报道：“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谭平教授通过对二十多所大学贴吧近六年的研究显示，在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九年出生的学生中，进入大学以前记忆最深刻，实际上也是对他们影响最大的偶像主要有：动漫形象，如《神笔马良》等。”这充分说明《神笔马良》这部经典童话作品是深入人心的，是经久不衰的。

新时期，《神笔马良》将不断焕发出生机与活力，继续陪伴一代代的孩子同成长、共进步！



诗情献给生命的礼花

梁鸿鹰


巴·布林贝赫

巴·布林贝赫是我敬仰已久的著名诗人、学者，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内蒙古大学简朴的校园里，在我们教学主楼共用的楼梯上，在为高大白杨所掩映的道路上，我经常与这位清瘦、和蔼、持重的蒙族诗人相遇，他总是面带微笑，前倾着身子，微微低着头，目光始终朝向前方，那种从容和坚定，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是学校里几个以成就卓著而享有崇高声望的著名教授之一，但他永远是那样的朴实与谦和。在他赠与我们的宝贵财富里，有不朽的诗行，更有不灭的精神，无论是在过去的岁月里，还是长久看来，都具有极大的价值。

这种价值，是诗人由其创作承载、播撒的，正如俄罗斯一位伟大批评家所说的那样，“诗人是精神的最高贵的容器，是上天的特选宠儿，大自然所宠信的人，感情和感觉的风神之琴，宇宙生命的枢纽器官。”巴·布林贝赫先生的精神追求，之所以至今与我们相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始终与祖国、与时代、与人民保持着血肉联系，他的伟大灵魂、热烈情感，一刻不停地向着哺育他的祖国，向着滋润他的草原，对温暖的渴望使他义无反顾地扑向新生活的曙光，他深切地感到：“脱离生活的创作是玄虚的；回避心灵的诗歌是苍白的。”因此，他把自己对新生活的理解、感悟，统统地化作诗歌创作的素材，他以做一位新社会的歌手而自豪，这种自豪更加强化了他的爱，他说：“在我看来，对于母亲的爱、对祖国的爱和党的爱，不可分解地融为一体。我有这样一个天真的想法：新社会歌手的一生应当在爱中度过。”（《巴·布林贝赫诗选》自序），我们看到，诗人以最充沛的感情讴歌共和国给生活带来的每一点滴变化，把自己的诗情，与祖国发生的每一点滴的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把最美的诗行献给那些创造新生活，为祖国繁荣昌盛谱写新篇章的人们，他在《女仆和仙女》中，热情赞颂由昔日女仆变为“敏捷地工作在崭新的纺织机旁”的纺织仙女的骄傲，在《一束钢花一杯奶酒》里，他为昔日的牧人转变为钢铁工人拍手叫好：“钢花钢花，开在白音宝拉格泉边，/金星金星，升在白云鄂博山顶；/快马、套杆，昨天游牧的蒙古，/电光、铁钎，今天钢铁的民族。”作为一个牧民之子，他深刻感受到新中国的伟大，毫无保留地赞颂着新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从他为动画片《草原英雄小姐妹》主题歌所作的歌词里，我们看到那明快的节奏、欢快的旋律背后，是对祖国、对新时代、对伟大建设的无比自豪：“天上闪烁的星星多啊 星星多/不如我们公社的羊儿多/天边漂浮的云彩白呀 云彩白/不如我们公社的羊绒白/啊哈哈嗬嘿 啊哈哈嗬嘿/不如我们草原的羊绒白/啊哈嗬嘿/草原开放的花儿多啊 花儿多/不如我们新盖的厂房多/山涧的花鹿快呀 花鹿快/不如我们来往的汽车快/啊哈哈嗬嘿 啊哈哈嗬嘿/不如我们来往的汽车快/啊哈嗬嘿。”“诗人不但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了客观世界，而且还塑造了自己的灵魂和形象。”从诗人的诗行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大写的人的形象。

诗歌是一个民族直接感知和认识世界的方式，其勃发最深厚的根源，有赖于对民族传统的把握，对民族生活方式、世界观的了解，有赖于对生存环境的感情，巴·布林贝赫是贫苦的草原牧民之子，如果没有水草丰茂肥美草原的养育，就不会有他对大自然的无比热爱，如果没有勤劳善歌的母亲的熏陶，对蒙古族文化的认识就没有那么深刻，得到的民间文艺营养就没有那么充沛丰富，“辽阔草原的自然之美，纯朴牧民的心灵之美，摔跤手们的体态之美，是我诗歌创作的美感源泉。”“我的诗，来自迷茫的沙漠和广袤的草原深处，来自童年的天真记忆和成年的深沉感受。”他还说，幼时过年母亲想方设法弄点鲜奶让孩子们尝尝，以祝愿孩子们心灵的纯洁和生活的明亮，当生活照亮诗人心灵的时候，就萌发了他的第一首成名作《心与乳》。从此，巴·布林贝赫先生的诗句，就从来没有脱离过大地与草原，河流与天空，正像他的诗情从来没有脱离草原牧民的生活一样，他的诗句与辽阔的草原息息相通，与清新的自然融为一体，他书写的主题，无不从大自然的律动起笔，他赞美的人们，无不是草原上那些辛勤的儿女，一九五八年诗人有首题为《杏花》的诗，写的是人们在文化生活方面的变化，但起笔却是：“绵绵的春雨下了一个夜晚，/黑色的土地顿时变得松软。/杏树在晨雾中吐放着艳蕊，/花瓣上浮动着透明的露滴。”他充分吸收了民间诗歌起兴的手法，总是将牧人最熟悉的景象，草原上最常见的动物、植物、自然现象，以及牧民最常穿戴的服饰作为自己起兴的依据，放到自己诗作最珍视的位置。如《生命的礼花》一诗，这样起兴：“每当吃到鲜美的奶油，/心就想起苦涩的奶水；/每当望见明媚的阳光，/心就想起黑暗的岁月。”扶持自然。如《打猎》一诗这样开头：“七彩的云朵，/忽上忽下，/七色的骏马/忽东忽西”，然后在过渡到：“七色的鸟群里，/乳白色的海鸥最美；/三只白色的海鸥呦，/在碧绿的海波上疾飞。”他的诗歌都是丰富无比的现实生活所激发的心灵的声音，他的诗朗朗上口，就在于不从概念出发，不无病呻吟，全部从最具体的感性的事物落笔。他的诗写景、抒情、叙事兼善，他的诗作灵活而多样，从他的诗里，我们听到了隆隆的雷声，潺潺的流水，听到了雄狮的怒吼、夜莺的啼啭。

我们固然留不住飞逝的岁月，但时光绝对冲不走诗人的荣光。我们该用自己的生活足迹，延伸对诗人心灵的纪念。

绿 缘 往 事

——写在国际环境保护日到来之际

高 桦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中国环境报主编“绿地”副刊，为讴歌祖国大好河山，扩大创作队伍，动员作家们关注环境保护——因为工业文明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在生态环境和精神道义上困窘着一代人。作家更容易接受环境保护的理念与实践，这缘于他们对生活的敏感，对祖国美好河山和一切生命的尊重和热爱。因此，他们对生态环境恶化和一些破坏环境的行为更加深恶痛绝。他们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使他们能积极地加入到关爱环境保护的行列。著名作家王蒙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作家天然是环保工作者的同盟军。

在作家们积极参与环境保护，撰写保护生态环境文章的同时，我联想到社会上出现的一些国外环境方面的文章，以及国内“绿色食品”的概念开始时髦起来，经销商在销售的蔬菜、水果、茶叶、粮油等产品上，都标上“绿色”“有机”一类的字样。食品如此，作为精神食粮的文学不就更应该强调绿色吗？我把创作生态环境文学作品、传播生态文化叫做“环境文学”的想法，向著名作家冯牧、王蒙、邓友梅及时任国家环保局局长曲格平、副局长金鉴明等说出来，请他们考虑。后来，曲格平局长责成国家环保局宣教司司长杨朝飞主持召开了有冯牧、陈荒煤、雷加、周而复、王蒙、邓友梅、张洁、从维熙、陈建功、张抗抗、章仲锷、张守仁、刘心武、张贤亮等人参加的座谈会，几次研讨了我的这个想法。与会者一致认为：文学加上“绿色”，叫“环境文学”，是一种新的品种。随着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开展，公众对其越来越重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环境意识的增强，特别是在环境保护成为基本国策之后，愈来愈多的作家取得了共识。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保护环境是不分国界、不分民族、不分社会制度和宗教信仰及政治态度、观点主张的，作家也包括在内。作家们共同携手合作对污染破坏大自然的事情或行为，用文学的形式进行揭露批判，日本、英国管这种文学作品叫“公害文学”。而根据我们国家的国情，在环保事业发展壮大、公众环境意识提高的局面下，环境文学作品不仅仅是揭露破坏污染环境的坏人坏事、环境意识淡薄的丑事蠢事，还要大力讴歌促进环保事业蓬勃发展默默做出贡献的广大环保工作者，歌颂关心生态环境、热心保护的新人新事、新道德风尚，抒写祖国壮丽河山，描写大自然和人与自然的关系。

“环境文学”并非凭空产生，有其历史渊源。中国古代人就写了大量描写祖国大好山河、珍惜自然生态的美文，传诵至今。所以，环境文学的提出，是维护生态平衡、加强环境保护意识在我国由无知转为自觉的一种表现，也是文学的一种自省和进化的体现。我所倡议的“环境文学”，最终得到了作家、环保专家们的一致认可。

多年来我一直致力于生态环境文学的提倡与组织工作。那时，我不仅主编“绿地”副刊，还在冯牧、王蒙等作家的支持和帮助下，组建了“环境文学”研究会、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还创办了国内唯一、世界少有的生态环境文学刊物。王蒙建议刊名叫《绿叶》，著名作家冰心、夏衍书写了刊名。创刊号出来后，我送给冰心老人，她当即在创刊杂志上签了名，并题写“绿叶是第一个给苦度严冬的‘天下寒士’最初的风和日暖”，还将亲手撰写的文章《从一数到九十二》交给我，并嘱在《绿叶》上发表。老一辈作家还有艾青题“我要空中一片兰，地上一片绿”、杨沫题“大地上如果没有绿叶不知有几多生命还能存在”、严文井题“尊重绿叶，珍惜生命”等。著名作家肖军、骆宾基、端木蕻良、周而复、冯牧、陈荒煤、韦君宜、雷加、王蒙、从维熙、邓友梅、邵燕祥、蒋子龙、黄宗英、张贤亮、刘心武、李存葆、舒乙、章仲锷、崔道怡、张守仁、张抗抗、陈建功、赵大年、毕淑敏、徐坤等都积极支持，并主动走基层采访，收集素材撰写了小说、报告文学、散文等美文发表在《绿叶》上，在国内外影响很大，同时也受到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肯定，并获全球五百佳提名。

环境文学研究会组建后，先后组织作家们到福建、广东、山东、山西、河北等地采风。著名作家谌容到山东恒台县对污染非常严重的“马踏湖”考察，在环保干部的陪同下走访了受害群众，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收集了大量素材，最终写出了二十多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死河》，在广东出版。解放军艺术学院的青年作家们深入到胜利油田采风后，写出了一批有分量的作品，如孙决的《面对自然的困境——一群人与一片盐碱滩所告诉我们的》、江奇涛的《最年轻的土地——人与自然之间的故事》、庞泽云的《绿色三重奏》、庞天舒的《寻找那一片绿荫》等。在我们的组织下，更多的老中青作家走访基层，写作的上百篇报告文学、散文，如雷加的《草原——“水”》、林斤澜的《绿》、陈祖芬的《在通往进步的阶梯旁》、刘心武的《万花拥京城》、赵大年的《青山藏哲理》、张守仁的《绿色的歌》、章仲锷的《环境与旅游》、傅溪鹏的《绿梦之恋——京津周围地区绿化工程》、李景田的《寸草心》、李景平的《绿歌》、李良的《龙江怨》等分别发表在“绿地”副刊及《绿叶》和全国各地报刊上。

我们还举办了各种征文活动：“祖国环境美”“胜利杯”“绿色三明杯”“绿叶杯”，全国广大专业和业余作者的来稿有成千上万篇，我们请专家从中评选出上百篇优秀作品。获奖者有：铁凝、李存葆、刘恒、张炜、叶广芩、赵瑜、何建明、赵大年、焦祖饶、方敏、徐刚、哲夫、郭雪波、李松涛、胡东林、李江树、李景田等，并在人民大会堂等地召开颁奖大会。赵大年至今还总提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任重在人民大会堂给他颁奖的事呢。获奖作品分别编成《春风无形》、《绿色三重奏》、《绿草地·绿草地》、《草叶集》出版。一九九五年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时，我作为中国妇女代表出席了会议，为大会编辑了《地球·妇女》专辑。由全国妇联、国家环保总局授予“全国环境妇女百佳”称号。

一九九五年初，德国法兰克福市的环保局局长来北京访问，他走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邓友梅时问道：“你们的作家写生态环境的文章吗？”邓先生答：“有！我介绍你认识一位女士，她叫高桦，她就是倡议在中国组织作家关爱环境保护、创作保护生态环境的作品，而且有组织、有刊物。”这位环保局局长要求见我，还希望把会见安排在北京动物园，因为他女儿喜欢中国大熊猫。他临出访前答应要把自己与大熊猫的合影送给女儿。时任中国环境报社长、现任国家环保部副部长的张力军也参加了会见。我向这位法兰克福市环保局长介绍了中国有关生态环境的状况，介绍了作家关注生态环境保护、热爱环境文学创作的情况。因为作家们已意识到，从文化角度看，歌颂生命与大自然，也包括生态道德与环境伦理，对城市、农村生态环境的治理、对草原湿地的保护、对森林不准乱砍滥伐、不戕害幼小生灵、不啖食珍稀动物等，写这样内容的文章是作家们的责任。他听过我的介绍，高兴地对我说：“欢迎你到法兰克福市看看，我是做环境保护工作的，我是‘绿党’，希望你加入我们的‘绿党’。”我笑了，因为我是共产党员，无法回答他。会后请他共进午餐，他声明似的表示：“我希望在动物园会面，是因为我想看看中国的动物，但绝不吃动物做成的菜肴。”我们都哈哈大笑，告诉他：“咱们都是保护动物的环保工作者。”

离休后，我本可以颐养天年，过清闲的日子，但是我不甘寂寞，不甘心放下恋恋不舍的环境文学事业，仍然坚持主编《绿叶》刊物的工作好几年，还将发表在各报刊上与有关生态环境的优秀文学作品收集起来，邀请了著名编辑家章仲锷、张守仁、刘茵帮助精选，有铁凝的《秀色》、陈建功的《放生》、蒋子龙的《消息不宜披露》、张抗抗的《沙暴》、张炜的《鱼的故事》、叶楠的《大沟》、林希的《爆米花》、李国文的《老海失踪》、赵大年的《瀚海之谜》、郭雪波的《沙狼》、方敏的《大绝唱》、哲夫的《愚人天空》等六十余篇小说；徐刚的《水啊，水》、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黄宗英的《没有一片绿叶》、赵瑜的《第二国策》、曹岩的《北中国的太阳》、何建明的《流水沧桑》、张坤民的《正确的抉择》、杨朝飞的《地球·人·警钟》、许正隆的《大潮涌起的地球盛会》、赵晓的《降“魔”计》等报告文学一百零七篇；肖乾的《屋顶何不成花园》、杨沫的《莺鹂何时鸣翠柳》、孙犁的《黄鹂——病期琐事》、冰心的《从一数到九十二》、周而复的《千岛竞秀》、韦君宜的《北京街上的树》、冯牧的《愿绿叶永远绿》、徐迟的《黄山记》、陈荒煤的《但愿霜叶红似二月花》、吴祖光的《拆掉景山墙》、新风霞的《打麻雀》、袁鹰的《古迹和古树》、王蒙的《海的颜色》、李存葆的《鲸殇》、冯骥才的《墓地》、张洁的《把退却变成胜利的行家》、张贤亮的《土地渴望生命和智慧》、邵燕祥的《最后的净土》、刘心武的《与绿叶互爱》、从维熙的《绿色随想》、孟伟哉的《吝啬些再吝啬些》、赵大年的《水》、舒乙的《莽莽生命大地》、赵丽宏的《甘南素描》、毕淑敏的《常常爱惜》、何西来的《虎情悠悠》、俞天白的《竹韵悠长》、张虎的《骆驼草，沙枣树》、金辉的《长江源碑记》、曲格平的《我的梦想与期待》、杨矛的《中国应成为爱鸟之国》、杨兆三的《山水寄情》、黄振中的《白色污染背后》、李世东的《收弓折箭在何时——野生动物保护难点探究》、段松君的《哭“毁”林碑》、吴诚的《中华鲟在黎明前死去》、高杰、徐小怙的《珍龟奇鳖戏》、张可兴的《光彩熠熠的事业——记全球五百佳李双良》等三百二十五篇散文，编辑出版成三辑九卷，三百八十万字四百九十三篇文章的《碧蓝绿文丛》。

近几年，我仍然坚持不懈地为发展绿色文化尽心尽力地做，组织了很多作家及书画家参与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各种活动。在全国举办书画展，编辑优秀作品集。我将铁凝的《告别伊咪》、梁晓声的《一个和虎有关的故事》、李存葆的《最后的野象谷》、陈染的《我们的动物兄弟》、邓友梅的《为鹿代言》、何西来的《扎龙观鹤记》、吉狄马加的《敬畏生命——献给藏羚羊》、赵大年的《假如没有大象》、张抗抗的《虎啸——为虎代言》、徐小斌的《苏铁：古老的沉默的精灵》等五十七篇作品编辑成书，书名为《生命的喟叹》。我还将石湾的《绿风吹遍红土地》、王贤根的《鄱阳湖情怀》、曹岩的《当冰雪灾难突然袭来的时候》、查干的《读雾匡庐》、崔道怡的《山水江西》、方敏的《走进鸳鸯湖》、章仲锷的《鄱阳湖城甲天下》、陈永康的《护鹿人之歌》等四十万字三十五篇作品编辑出版成《一群文人一片绿》，这是作家们走访了江西这片红土地后，对革命老区关怀的成果。国家林业局贾治邦局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建功专门为其作序。

文学是心灵的一面镜子，是现实生活的提升，是充实精神生活、净化人类心灵的方式。环境保护是党的号召，是地球的呼唤，是生命的吟歌，是文学的天职。环境文学是绿色的，是最鲜活、最富于营养的精神食粮。在今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中，更应大力提倡和发展绿色文化。我愿在我有生之年与大家共同努力。